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饮茶生活及其文化意蕴

钱国旗¹ 薛繁洪²

1.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烟台 264025; 2. 汕头市华侨历史研究中心, 广东汕头 515041

摘要: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饮茶之风浓厚,文人雅士是推动明代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茶息息相关,诸如读书、文艺、社交、旅行等,皆离不开茶。他们煮茶品茗,舒展性灵,在日常饮茶清事中体现价值追寻,寄托理想人生。作为茶文化内涵的赋予者,江南文人对茶性的体认折射出当时文士群体的心性。茶具有平和冲淡、提神醒脑、自然纯真的本性,与江南文人淡泊自守、静虑自省、贵真求真的精神追求相契合,饮茶生活还寄托着江南文人恬淡闲适的隐逸情怀,由此为明代茶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所呈现的文化意蕴,构成了明代茶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

关键词: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茶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48.4;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1)03-0046-12

在中国古代文人生活中,饮茶是一项清雅幽趣的休闲活动。茶作为传统文人寄托精神、抒发性灵的载体,表现出深厚的文化意蕴。明代中后期,以苏州府为核心的江南城镇文化地带,聚集了常州、松江、嘉兴等府的文人集团成员,这些文人皆以诗文书画闻名于世,同时又以茶人身份主导一代饮茶风尚,创造别样的饮茶生活。^①当时的江南社会弥漫着一股嗜茶品茗之风,文人雅士因性情、志趣、雅尚相契,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茶人群体。^②作为推动明代茶文化发展的精英群体,江南文人在个人饮茶实践和前人茶论的基础上,纷纷著书立说,研讨茶艺,掀起了浓厚的饮茶风尚。茶不仅是读书益思的必备良品、文艺增趣的理想饮品,更是社交雅集的重要媒介和旅行助兴的辅助手段。

一、江南文人日常生活中的茶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茶息息相关,诸如读书、文艺、社交、旅行等,皆离不开茶。丰富多彩的茶事活动,升华着文人的日常生活。

作者简介:钱国旗,男,江苏太仓人,历史学博士,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薛繁洪,男,福建福清人,汕头市华侨历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① 参见吴智和:《明代茶人集团的社会组织——以茶会类型为例》,《明史研究》(第3辑),1993年,第110页。

^② 相关研究成果见吴智和《明代的茶人集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大明茶人集团的饮茶性灵生活》(《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晚明茶人集团的饮茶性灵生活》(《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等系列论文,以及胡长春《明朝文人茶事概述——兼论明代江浙地区的文人饮茶集团》(《农业考古》2008年第2期)、徐林《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施由明《明清中国茶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等论著。

(一) 读书益思的必备良品

由于茶具有破睡提神的功效,因此古人读书常以茶相伴。文人徜徉于经史子集中,在读书的片刻静品茶香氤氲。江南自古人文荟萃,重学风气浓厚,加之地处名茶产地,因此茶成了江南文人读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益思良品。明代中后期,文人读书并非只为科举一展抱负,也有出于自身性格、喜好,特别是隐逸文人,为隔绝世间纷扰,常常闭门读书,烹茶品茗,并从中追求雅趣。

苏州府长洲县人文征明(1470—1559),精于诗文,工于书画,嗜茶如命,自谓“吾生不饮酒,亦自得茗醉”^①。他的诸多茶诗记录了读书啜茶的乐趣,如“小院风清橘吐花,墙阴微转日斜斜。午眠新觉书无味,闲倚阑干嗽苦茶”^②。又如“茗椀薰意有余,日长人散闭精庐。俄然屋角凉风顺,吹起新蝉乱读书”^③等。文征明闭门读书,少了世间纷扰,静静享受着个人的美好时光,当读书困乏或午睡初醒之时,啜一杯清茶,让烦闷的心绪得到安顿,人格得到了升华。

洞庭西山张源,志甘恬淡,性合幽栖,嘉万年间隐于山林间读书烹茶,深究茶学,作《茶录》名垂茶史。顾大典为《茶录》作序时称:“其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故所著《茶录》,得茶中三昧。”^④读书之暇品茗,为张氏枯燥的山居生活增添了些许乐趣。

饮茶能清神益思。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1558—1639),松江华亭人,自幼颖异,志向高雅,工于诗文书画,集编《小窗幽记》讲述修身治学、为人处世之道,他回忆旧日生活时提及他品饮苦茶的心境:“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空灵,面上尘当亦扑去三寸。”^⑤他自述与书为伴的饮茶闲趣:“茅斋独坐茶频煮,七碗后气爽神清;竹榻斜眠书漫抛,一枕余心闲梦稳。”^⑥其诗《赠醉茶居士》点出饮茶助学的强大功效:“山中日日试新泉,君合前身老玉川。石枕月侵蕉叶梦,竹炉风软落花烟。点来直是窥三昧,醒后翻能赋百篇。却笑当年醉乡子,一生虚掷杖头钱。”^⑦晨起饮茶是他的日常清事,当醇香的清茶入喉,他不禁发出“醒后翻能赋百篇”的感叹,虽略显夸张之意,但说明了饮茶对日常读书具有提神助攻的作用。

午睡初醒,精神抖擞,此时若烹茶品茗,翻阅书籍,亦有一番乐趣。主要生活在明万历时期的浙江钱塘人高濂,以戏曲名于世,性嗜茶,幽居时“坐雨闭关,午睡初足,就案学书,啜茗味淡,一炉初熟,香霭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⑧。张大复(1554—1630),苏州昆山人,以戏曲擅世。有一次,他闻得其子朗朗的读书声,毫无午睡困意,在煮茶品茗之后,令其子快读李贽的《焚书》,竟越发清醒。《梅花草堂笔谈》言:“料理息庵,方有头绪,便拥炉静坐,其中不觉午睡昏昏也。偶闻儿子书声,心乐之,而炉

① (明)文征明:《文征明集》(增订本上)卷一《五古》,周道振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页。

② 《崇义院杂题》,《文征明集》(增订本上)卷十四《七绝》,第386页。

③ 《崇义院杂题》,《文征明集》(增订本上)卷十四《七绝》,第387页。

④ (明)张源:《茶录》,载于杨东甫主编《中国古代茶学全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0页。

⑤ (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五《素》,罗立刚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0页。

⑥ 《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五《素》,第69页。

⑦ 刘枫主编:《历代茶诗选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⑧ (明)高濂:《遵生八笺》(下册)卷十二《燕闲清赏笺中》,王大淳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634页。

间寥寥如松风响,则茶且熟矣。……亟取二味品之,而令儿子快读李秃翁《焚书》,惟其极醒极健者。”^①

除了白天读书,夜读也是古人的生活常态,此时若无清茶提神,便让人感到困倦。松江华亭人莫是龙(1537—1587)认为:“人生最乐事,无如寒夜读书,拥炉秉烛,兀然孤寂,清思彻人肌骨。坐久,佐以一瓯茗,神气益佳。尔时闻童子鼻息,足当数部鼓吹。”^② 嘉兴人冯梦桢(1548—1605)喜欢啜茗夜读,其日记多处记载他夜读饮茶,如“(万历十八年四月初六,雨,夜始不闻雨声,稍寒。作《潘去华报书》。贮天落水烹茶。天落水虽不及梅水,亦堪烹茶。夜读《选·赋》”^③。

此外,在许多明人文集中亦常提及时人读书品茗、书茶相伴的史实。浙人章懋(1437—1522)在其文集中记录了逸轩处士周氏日常嗜书好茶之琐事。周氏“晚岁筑书室于西溪,而环以竹松,日徜徉其间,客至则焚香煮茗,治具相饮,壶弈觞咏以为乐,虽久而弗厌也。室中所蓄,惟经史子集及百氏之书”^④。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记载了一个叫何上舍的文人不仅酷爱收藏书文,还在阅书览卷时品茗助读:“何上舍道光独喜藏书,……焚香煮茗,哦咏万卷中”。^⑤ 读书以茶相伴,以茶益思,不仅提高了文人读书的效率,还提升了文人的生活品味。

(二)文艺增趣的理想饮品

文人饮茶的形式丰富多彩,若与各种文艺活动,如琴、棋、书、画“四艺”等清事相配,文艺和茶事活动则更显幽雅清逸。

弹琴作为文人“四艺”之首,颇受文人喜爱。在古人交往中,悠扬的琴音是雅境和友情的象征。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1378—1448),曾构筑精庐,深自韬晦,鼓琴读书,以茶明志,其《茶谱》记载饮茶之余鼓琴弈棋的乐趣:“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遂出琴棋,陈笔砚。或庚歌,或鼓琴,或弈棋,寄形物外,与世相忘。斯则知茶之为物,可谓神矣。”^⑥ 具有文化修养的文人雅士,弹琴品茗,恰到好处。评述晚明文人生活起居、文房用具的《考槃余事》记载:“弹琴之人,风致清楚,但宜啜茗,间或用酒发兴,不过微有醺意而已。”^⑦ 文人品茗时,若配上琴艺,茶助琴幽,琴助茶雅,无疑为茶境增添了艺术气息。

弈棋是传统游艺之一,文人相聚时,在品茗清谈之余,时常也过过棋瘾。饮茶能使下棋者提神益思,茶弈并行不失为一项清课雅事。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弈棋者众多,不仅有文人与文人间的对弈,有的文人还在山林禅院中与僧道下棋,出现了士僧对弈的情形。“棋禅一味,茶禅一味,其构建的棋之境,茶之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棋与茶通可悟人,棋与茶,既参与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又成了一种‘艺’,具有了审美的和形而上的‘道’的意义。”^⑧ 文征

①(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上)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7页。

②(明)莫是龙:《笔尘》,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③(明)冯梦桢:《快雪堂日记》卷四,丁小明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④(明)章懋:《枫山章先生集》卷五《逸轩处士周君墓志铭》,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5—156页。

⑤《梅花草堂笔谈》(下)卷十三,第861页。

⑥(明)朱权:《茶谱》,《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152页。

⑦(明)屠隆:《考槃余事》卷二,秦跃宇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⑧盛敏、刘仲华:《棋茶一味可通禅——从陆游的棋诗、茶诗看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明茶诗中记录其与友人对弈品茗的情形：“山斋雨歇书沉沉，得与幽人一散襟。矮榻薰罍消茗碗，小窗棋局转桐阴。笑谈未觉风流减，违阔翻怜契分深。莫自匆匆骑马去，绕簷斜日乱蝉吟。”^①试想，黑白棋子在棋盘中变幻莫测，弈棋者一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当一杯清茶过后，思路顿开，先前处于下风的弈棋者转败为胜，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书法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是文人的看家本领。在烹茶品茗之余，泼墨挥毫，或练习书艺，或品题名画，无疑是一种艺术享受。江南名士王问（1497—1576）致仕而归后，闭门谢客，常以品茗弄墨为乐，“性不饮酒而喜啜茗。筑绿萝小径，每遇风清月白，净几明窗，兴至举笔，或书或画，辄写数十幅，如有神助，自谓径丈大字，至老有进，凡仕宦过锡者，踵门求见，往往以疾辞，而独好静颐。”^②王问鄙弃世俗的纷扰，在风清月白之际、净几明窗之旁，煮茶品茗，舞文弄墨，或书写或绘画，如有神助创作了数十幅书画，令人折服。

品茶绘画赏画也是一项高雅的艺术活动。江南文人绘画题材广泛，风格变化多样，他们以茶事活动作为题材，创作了诸多清幽空灵的茶画。除了品茶绘画，把卷赏画亦是日常雅事。陈继儒山居期间常饮茶观画，“独坐丹房，潇然无事，烹茶一壶，烧香一炷，看达磨面壁图，垂帘少顷，不觉心静神清，气柔息定，濛濛然如混沌境界”^③。高濂《遵生八笺》记述了江南文人晴日饮茶玩画的乐事：“茶以雪烹，味更清冽，所谓半天河水是也。不受尘垢，幽人啜此，足以破寒。时乎南窗日暖，喜无鬚发恼人，静展古人书轴，如《风雪归人》《江天雪棹》《溪山雪竹》《关山雪运》等图，即假对真，以观古人摹拟笔趣。要知世景画图，俱属造化机局，即我把图，是人玩景，对景观我，谓非我在景中？千古尘缘，孰为真假，当就图画中了悟。”^④品茗时舒展画卷，让人忘却世间纷扰，仿佛进入虚静空灵的画卷中。

饮茶与琴棋书画相结合，不仅增添了茶境的趣味，也提升了饮茶者的艺术品味。史载：“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⑤煮茶品茗作为文人休闲时尚的一部分，进一步推动了文人阶层雅文化的发展。

（三）社交雅集的重要媒介

茶不仅是读书之暇提神益思的必备良品，也是文人社会交往中增进友谊的重要媒介，“有时还成为社交中一种凭借，以及士人身份价值获得提高的一种尺度”^⑥。

在江南文人社会交往中，茶成为待客必备之物，友人来访时便以茶迎客。文征明诗云：“碧山深处绝纤埃，面面轩窗对水开。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⑦陈继儒山居期间，每当有客来访，便备茶招待，畅言一番，直至友人日暮而归：“垂柳小桥，纸窗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书一卷，客来则寻常茶具，本色清言，日暮乃归，不知马蹄为何物。”^⑧文友相会必然诗文唱酬，抑或放声高歌：“客到茶烟

① 《停云馆与昌国闲坐》，《文征明集》（增订本上）卷七《七律》，第144页。

②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十二《高尚》，哈佛燕京学社1940年（影印本），杭州：杭州古旧书店，1983年。

③ 《小窗幽记》（外二种）卷四《灵》，第52页。

④ 《遵生八笺》（上册）卷六《四时调摄笺冬》，第294页。

⑤ （明）文震亨著，陈植校注，杨超伯校订：《长物志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423页。

⑥ 徐林：《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⑦ 诗后跋文：嘉靖辛卯，山中茶事方盛，陆子传过访，遂汲泉煮而品之，真一段佳话也，《文征明集》（增订本中）补辑卷十二《七绝》，第1069页。

⑧ 《小窗幽记》（外二种）卷六《景》，第90页。

起竹下,何嫌展破苍苔;诗成笔影弄花间,且喜歌飞《白雪》。”^①冯梦桢常以茶待客,并深得饮茶方法,得到客人的称赞。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记载:“冯开之先生喜饮茶,而好亲其事。人或问之,答曰:‘此事如美人,如彝鼎,如古法书名画,岂宜落他人手?’闻者叹美之。然先生对客谈辄不止,童子涤壶以待。会盛谈未及着茶时,倾白水而进之。先生未尝不欣然,自谓得法,客亦不敢不称善也。世号‘白水先生’云。”^②

作为文人社会交往的必备饮品,饮茶象征着人际交往中率性适趣、清淡洒脱的“道义之交”。^③李诩《真率铭》道:“弗尚虚礼,不迎客来,不送客去。宾主无闲,坐列无序,真率为约,简素为具。有酒且酌,无酒且止,清茶一啜,好香一炷,闲谈古今,静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论官府,行立坐卧,忘形适趣,冷淡家风,林泉清致。道义之交,如斯而已。”^④茶性清新高雅,待客时人数的多寡也不容忽视。张源认为:“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⑤

茶在文人社交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还体现在茶叶的寄赠方面。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文人交往频繁,当面赠茶或托人寄茶成为文人联络情谊的重要桥梁。当文人收到友人寄送的茶叶后便试茶品茶,在享受茶韵芬芳之时作诗回馈以示感激。文征明收到好友吴大本寄来茶叶后欣然作诗表达谢意:“小印轻囊远寄遗,故人珍重手亲题。暖含烟雨开封润,翠展枪旗出焙齐。片月分明逢谏议,春风仿佛在荆溪。松根自汲山泉煮,一洗诗肠万斛泥。”^⑥明代名臣、苏州长洲人吴宽(1435—1504)收到好友朱懋恭赠茶后抒发自己品饮龙井茶的愉悦之情:“谏议书来印不斜,忽惊入手是春芽。惜无一斛虎丘水,煮尽二斤龙井茶。顾渚品高知己退,建溪名重恐难加。饮馀为比公清苦,风味依然在齿牙。”^⑦徐渭(1521—1593),绍兴府山阴县人,平生落魄坎坷,玩世不恭,在其茶诗《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中抒发了他视赠茶人的友谊如冰心玉壶之纯洁:“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却从梅月横三弄,细搅松风地一灯。合向吴依彤管说,好将书上玉壶冰。”^⑧明代书画家、收藏家李日华(1565—1635),浙江嘉兴人,著有《味水轩日记》八卷,实录其日常艺术生活,日记除了谈艺之外,多述交游及东南海事,其中还记录了不少僧人寄茶赠茶的史实。^⑨可见,茶已成为文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社交媒介,通过以茶待客、赠茶寄茶等形式,不仅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还促进了江南地区茶风的兴盛。

明代中后期,以茶会为形式的文人雅集之风在江南地区兴起,如较为著名的山水雅集茶会以正德十三年(1518)的惠山茶会为代表,文征明为此次茶会绘制《惠山茶会图》,书法家蔡羽在茶画上挥毫记录其事。^⑩当时春茶正兴,七人汲泉煮茗,吟诗酬唱,乐在其中。这次惠山盛会得到后世文人的

①《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七《韵》,第104页。

②《梅花草堂笔谈》(中)卷六,第374—375页。

③徐林:《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④(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真率铭》,魏连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页。

⑤(明)张源:《茶录》,《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63页。

⑥《谢宜兴吴大本寄茶》,《文征明集》(增订本上)卷八《七律》,第173—174页。

⑦《谢朱懋恭同年寄龙井茶》,刘枫主编:《历代茶诗选注》,第144—145页。

⑧刘枫主编:《历代茶诗选注》,第156页。

⑨(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屠友祥校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⑩参见(清)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卷四《文衡山惠山茶会图卷》,柳向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吟咏,清人王权作《文衡山惠山茶会图七贤诗草卷子为农山观察题》盛赞吴中文人的饮茶趣事:“开卷飞泉响,行间岚气生。亭台山气入,朋辈竹林清。野鸟窥吟客,松风答沸铛。好诗皆画意,况复绘图精。世味争醞膩,诸公嗜好乖。云霞收茗碗,岩窦引芒鞋。绝境东南最,畸人六七偕。便同修禊饮,墨迹韵高斋。”^①

(四)旅行助兴的辅助手段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多以游山玩水休闲寄情,他们三五成群,携伴出游,徜徉于自然之中以忘却世俗喧嚣,享受着山水之乐而不再迷恋功名利禄,表现出恬淡安乐的生活状态。许多文人重视旅途品茶之乐,经常携带茶具出行,或泛舟水上,或在林下溪边煮茗,在山水揽胜中品味茶之神韵。如许次纾所言:“士人登山临水,必命壶觞。乃茗碗薰炉,置而不问,是徒游于豪举,未托素交也。”^②

江南地区水网密布,许多文人钟情于舟游,往往携带简便的茶具出游,泛舟于江水湖泊之上,于舟上置茶具、览书卷,在饱览山水美景中享受品茗之乐,追求个人精神自由。龙膺《蒙史》言:“至若所云寒暑得中,体性无事,乘小舟,设蓬席,赍一束书、茶灶、笔宝、钓具而已,自称江湖散人,则窃有志而欣慕焉。”^③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记载了时人携带茶具舟游的情景:“(舟)前仓可容僮仆四人,置壶榼、茗炉、茶具之属;后仓隔之以板,傍容小弄,以便出入。”^④屠隆“用二画桨泛湖棹溪,更着茶灶,起烟一缕,恍若画图中一孤航也。”^⑤张岱《陶庵梦忆》多处描写湖中饮茶之事,如《西湖七月半》:“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⑥;《烟雨楼》写道:“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客至,则载之去,舫舟于烟波缥缈。态度幽闲,茗炉相对,意之所安,经旬不返。”^⑦在明人的许多文集中常见舟中品茗的记录。

松间竹下环境清幽,泉边石畔生机盎然,皆为文人出游途中理想的品茗之地。屠本峻《茗笈》云:“试相与松间竹下,置乌皮几,焚博山炉,鬲惠山泉,挹诸茗苑而饮之,便自羲皇上人不远。”^⑧沈周《是夕命童子敲僧房汲第三泉煮茶坐松下清啜》诗云:“夜扣僧房觅磻腴,山童道我吝村沽。未传卢氏煎茶法,先执苏公调水符。石鼎沸风怜碧绉,磁瓯盛月看金铺。细吟满啜长松下,若使无诗味亦枯。”^⑨吴宽《游惠山入听松庵观竹茶炉》诗云:“与客来尝第二泉,山僧休怪急相煎。结庵正在松风里,裹茗还从谷雨前。玉碗香酒挥且去,石床苔厚醒犹眠。百年重试筠炉火,古杓争怜更瓦全。”^⑩

寺院道观多居于深山幽林之中,远离世俗尘嚣,适应了文人对清幽环境的追求,自然成为文人品茗的理想场所。明代中后期,三教合流,文人与禅僧、道人交往频繁,文人在寺院道观饮茶过程中澄

①(清)王权:《笠云山房诗文集》卷五《文衡山惠山茶会图七贤诗草卷子为农山观察题》,吴绍烈等校点,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②(明)许次纾:《茶疏》,《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84页。

③(明)龙膺:《蒙史》,《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464页。

④《长物志校注》卷九《舟车》,第344页。

⑤《考槃余事》卷四《游具笈》,第98页。

⑥(明)张岱著,林邦钧注评:《陶庵梦忆注评》卷七《西湖七月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3页。

⑦《陶庵梦忆注评》卷六《烟雨楼》,第174页。

⑧(明)屠本峻:《茗笈》,《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408页。

⑨(明)沈周:《石田稿》,《沈周集》(上),张修龄、韩星婴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63—464页。

⑩陈彬藩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卷五《明代茶文化经典·明代诗词》,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408页。

明心境,修心养性,参透人生之真谛。由于茶性清淡素洁,增进了儒释道之间的联系。如徐爌《茶居士传》所云:“茶氏世好修洁,与文人骚客、高僧隐逸辈最亲昵。”^①钱塘人许次纾与弟许世奇游龙泓山时至寺中与僧品茶,“日品茶尝水,抵掌道古。僧人以春茗相佐,竹炉沸声,时与空山松涛响答,致足乐也”^②。钱塘人陈师在游山访寺之时也常与僧人饮茶:“予每至山寺,有解事僧烹茶如吴中,置磁壶二小瓯于案,全不用果奉客,随意啜之,可谓知味而雅致者矣。”^③

另外,野外亭轩也是江南文人向往的品茗之地。松江华亭人何良俊(1506—1573)记录了他与友人出游途中在山中亭轩品茶之事:“余羁旅无聊,九日约仲交文学一登灵应观。余凌晨即行,仲交揣香茗,领客徐西涧继至,相与宴坐亭中,焚香啜茗。仲交和墨点笔,作云林小景,倦宫寂寥,人境俱绝,留连览眺,迨暮方归。”^④

江南文人走出书斋庭院,在山水揽胜过程中煮茶品茗,到山水自然中享受人生之乐,或泛舟水上,或松间林下,或泉边石畔,或寺院亭轩,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活样态。

二、茶与文人的隐逸情怀

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繁华富庶,程朱理学式微,心学思想浸润着江南文士,使其心性得到舒展,加之仕途之路阻塞,江南文人心中“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发生动摇,他们开始投入世俗生活,有较多时间从事品茶这一高雅活动,希望在品茶中摆脱社会的种种束缚,追求自我意志独立,享受愉悦的人生。饮茶为文人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心灵空间,在职文人常在公务闲暇之余静品佳茗,寻求心灵寄托。另外,纲纪废弛,奸佞擅权,朝政腐朽,世风日下,许多士大夫脱离宦海生涯,或遭贬而归,或主动告乞。走出官场后,他们择一地隐居,摆脱世事纷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茶事活动中,不仅亲自种茶、采茶,还热衷于煮茶、饮茶,在俗世中回归自然,愉悦心境,这是中晚明江南文人适情适性、乐天知命的普遍追求。

当时以茶寄隐的时代风气十分浓厚。晚明官员陆树声(1509—1605)面对朝政不振,不与奸佞为伍,以茶自娱表心迹:“树声居尝闭门宴坐,焚香啜茗,启处服御,笑饮在所,休休然其和光。缀接里之执经问道,与士大夫东西行礼于其庐者,不择贤愚少长,皆意满去。王锡爵称其道不苦空而禅,不标炽而儒,不垢俗而隐。”^⑤他谢绝众人挽留,欣然回归故里,在松江城南构建了适园,以追求闲适的生活,《适园记》记录了他恬淡清雅的生活趣味,同时也寄托了他的隐逸情怀^⑥。他还在园中修建了饮茶专用场所茶寮,“园居敞小寮于啸轩埤垣之西。中设茶灶,凡瓢汲罍注、濯拂之具咸庀”^⑦,时常与僧人

① 吴康霖编纂:《六安州志》(下)卷五十一《杂体》,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688页。

② (明)许次纾:《茶疏》,《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73页。

③ (明)陈师:《茶考》,《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20页。

④ (明)林应麒:《介山稿略十六卷补遗一卷》影印版,载于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七十一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366页。

⑤ (明)何乔远:《名山藏》(下册)卷八十一《臣林记二十六 陆树声》,张德信、商传、王熙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54页。

⑥ 参见刘大杰:《明人小品集》,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第175页。

⑦ (明)陆树声:《茶寮记》,《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14页。

韵士开展茶事,品茗赋诗。

嘉兴府嘉善县人姚公绶(1423—1495),成化年间历经宦海沉浮,后因母老奉养辞官归于故里。《列朝诗集小传》记载了姚公绶隐居期间的自在生活:“成化初,出知永宁府,解官归。公绶善书画,初水墨,后遂进唐品,得古意。作沧江虹月之舟,游泛吴、越间,粉牕翠幙,拥僮奴,设香茗,弹丝吹竹,宴笑弥日。家设亭馆称是,作室曰‘丹丘’,自称丹丘先生。人望之亦以为神仙云。”^①弘治阁臣李东阳(1447—1516)在任时感叹仕途之艰辛:“十年宦游隔江海,此兴落落何由偿。”^②他致仕而归后过着率性而为、恬淡洒脱的饮茶生活,这从茶诗《东坡煎茶图次坡韵》中可以反映出来^③。明代文学家、太仓人王世懋(1536—1588)在公务之余常饮茶寄怀,他在《二酉委谭》中记录了其在南昌任上时,某日晚间月下品尝友人所赠西山云雾茶的情景:“时西山云雾新茗初至,张右伯适以见遗,茶色白,大作豆子香,几与虎邱埒。余时浴出,露坐明月下,亟命侍儿汲新水烹尝之,觉沆瀣入咽,两腋风生。念此境味,都非宦路所有。”^④他饮下西山云雾茶后,顿觉神清气爽,飘飘欲仙,感叹宦途之人难能品味茶的清味。闽人谢肇淛(1567—1624)常与江南文人品茗赋诗,享受饮茶之乐。他为喻政题作的一首诗正是其心境的写照:“山僮晚起挂荷衣,芳草闲门半掩扉。满地松花春雨里,茶烟一缕鹤惊飞。石鼎斜支傍药栏,松窗白日翠涛寒。世间俗骨应难换,此是云腴九转丹。”^⑤清逸幽静的田园环境,不为世俗名利所扰的心态,正是他所追求的。

明代茶书作者多为隐逸之士。长洲人顾元庆(1487—1565)隐居吴中,以煮泉烹茶为乐,删校钱椿年《茶谱》一书使之流传后世。作《茶疏》而闻名的钱塘人许次纾(1549—约1604)常携茶登山临水,煮茗为乐,与同样嗜茶的姚绍宪情谊深厚,时常交流品茶心得。生活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钱塘人陈师在职时亦有退隐之心,返归故里后,结交高人雅士,以茶为伴,终有《茶考》传世。宁波府慈溪县人罗廩(1573—1620)隐居山中期间,亲自植茶,历时十年,静坐山堂,鉴赏茶水,坚守隐士的品格。《芥茶别论》作者周庆叔为吴中名士沈周(1427—1509)密友,两人交往情深。周庆叔长期隐居于江南著名茶乡长兴,一生嗜茶,精于茶事,沈周在《书芥茶别论后》记载周氏居于山中恬淡自适的饮茶生活:“自古名山,留以待羈人迁客,而茶以资高士,盖造物有深意。而周庆叔者,为《芥茶别论》,以行之天下,度铜山金穴中无此福,又恐仰屠门而大嚼者,未必领此味。庆叔隐居长兴,所至载茶具,邀余素鸥黄叶间,共相欣赏。恨鸿渐、君谟不见庆叔耳,为之覆茶三叹。”^⑥隐逸之士热衷茶事,一方面在氤氲的茶香中获取超越人生困境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使种茶、制茶、品茶的经验不断得到总结和升华,由此推动了明代茶文化的发展。

有的文人隐遁山林后,仍与外界交流频繁。松江华亭人陈继儒三次科场失意后,对仕途心灰意冷,“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⑦。山居期间,安贫乐道,痴迷茶事,

①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乙集《姚御史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

② (清)邓显鹤编纂:《沅湘耆旧集》(第二册)卷九《李文正公东阳》,欧阳楠点校,沈道宽等校订,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163页。

③ 《历代茶诗选注》,第145—146页。

④ 陆廷灿《续茶经》引王世懋《二酉委谭》,《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864页。

⑤ 《为喻正之郡侯题〈烹茶图〉二首》,(明)谢肇淛:《小草斋集》(下册)卷二十八《七言绝句二》,江中柱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94页。

⑥ 陆廷灿《续茶经》引沈周《书芥茶别论后》,《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864页。

⑦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九八《隐逸·陈继儒》,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631页。

终有《茶话》《茶董补》等著作问世。他为江阴人夏树芳《茶董》作序时,不禁感叹茶隐生活:“何如隐囊纱帽,翛然林涧之间,摘露芽,煮云腴,一洗百年尘土胃耶?”^①在他眼中,仕途已与他无缘,忙碌于山间采茶、煮茶、品茶,乃是人生一大快事,希望通过清逸的茶事活动“一洗百年尘土”。他以茶比德,坚守自己的高尚节操,如其所云:“茶类隐,酒类侠;酒固道广,茶亦德素。”^②陈继儒身在山中,却名扬天下,尽管归隐山林,但仍与外界保持着联系。从他曾为应考士子题写《临场十策》可见,其身虽隐,心却未隐。钱谦益曾褒评陈继儒:“以仲醇之才器,早自摧息,时命折除,声华浮动,享高名食清福,古称通隐,庶几近之。”^③

有的文人一开始也有“学而优则仕”的追求,但是经过仕途受挫后心灰意冷,于是借饮茶来排除内心烦恼。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称的苏州吴县人唐寅屡次科举不售,又因宁王叛逆案所累,仕途的坎坷使他决定不再入仕。他所作《桃花庵与祝允明黄云沈周同赋五首》(其一)曰:“茅茨新卜筑,山木野花中;燕婢泥衔紫,狙公果献红。梅梢三鼓月,柳絮一帘风。匡庐与衡岳,仿佛梦相通。”^④这首诗明显表达了唐寅对隐于匡庐、衡岳等名山大川的向往之情。“怪才”徐渭也是坎坷之人,科场屡试落榜,因恐受胡宗宪案牵连,佯装疯癫,常在茶中寄托现实生活的苦闷。在《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一诗中,徐渭表现出率性而行的生活态度。他得到友人所赠的虎丘茶后十分欣喜,独饮佳茗,精致的紫砂壶泡上名茶,听上一曲“梅花三弄”,使得茶人完全沉浸在袅袅茶香之中。

三、茶性与文人的心性

饮茶不仅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感的物质消费,更是一项体现价值追寻的精神休闲。茶具有平和冲淡、提神醒脑、自然纯真的本性,与江南文人的某些精神追求相互契合,相得益彰。作为茶文化内涵的赋予者,江南文人对茶性的体认折射出当时文士群体的心性。他们嗜茶爱茶,精通茶艺,在煮茶品茗中将人生理想与精神感悟寄托于茶,在日常饮茶清事中呈现其处世态度与人文情怀,为明代茶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

(一) 茶性平和冲淡体现文人淡泊自守

在中晚明江南文人心中,茶性平和冲淡符合其对仕途人生的淡泊。唐代文人裴汶在《茶述》一文中认为茶具有平和冲淡的特性:“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⑤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亦认为茶具有“祛襟涤滞,致清导和”^⑥和“冲淡简洁,韵高致静”^⑦的功效。传统文人崇尚平和冲淡、含蓄沉稳的性格,并深受中庸思想的影响,采茶、煮茶、品茶都强调中和、冲淡,这也是茶叶本身所具有的品格。酒性热烈奔放,饮之易使人张扬个性,与现实社会产生对抗;茶性平和冲淡,饮之易使人清醒淡泊,缓和与现实社会的矛盾。明代中后期,纲纪废弛,宦官专权,

①(明)夏树芳:《茶董》,《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420页。

②《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五《素》,第79页。

③《列朝诗集小传》(下)丁集《陈征士继儒》,第638页。

④(明)唐寅:《唐伯虎全集》卷二《五言律诗》,周道振、张月尊辑校,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⑤(唐)裴汶:《茶述》,《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30页。

⑥(宋)赵佶:《大观茶论》,《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94页。

⑦(宋)赵佶:《大观茶论》,《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94页。

朋党之争激烈,身处庙堂之上的文人士大夫,难免会卷进政治纷争的漩涡,他们为坚守个人情操,不愿与奸佞同流合污,不愿屈服于蛮横强权,经常通过饮茶调理身心,安顿心灵。

吴中才子文征明,生于诗书世家,少时即享才名,然在科举道路上却很坎坷,九次应举均落第而归,直至54岁那年,他才受荐以贡生进京,待诏翰林院。四年中目睹官场腐败、人心险恶,仕途进阶之念在他心中逐渐黯淡,于是一再乞归,57岁回归故里,潜心诗文书画,只求淡泊闲适的人生。辞官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茶事生活中,创作了诸多涉茶作品。在他的茶画中,往往呈现与友人林泉品茗的场景,透露出脱离世俗纷争、栖息山林泉下的自守闲适之情。《品茶图》描绘了在清新空旷的山林下,文人间煮茶品茗的生活乐趣。《煎茶诗赠履约》体现了他闲适的饮茶生活:“嫩汤自候鱼生眼,新茗还夸翠展旂。谷雨江南佳节近,惠泉山下小船归。山人纱帽笼头处,禅榻风花绕鬓飞。酒客不通尘梦醒,卧看春日下松扉。”^①煮茶品茗,使得文人心境宁静淡泊、适情适性。以文征明为代表的许多江南文人将满身才华融入世俗生活,追求诗情画意、清逸冲淡的艺术人生,生活中弥漫着参透人生真味后的淡淡喜悦。茶性平和冲淡正与他们的性情相契合,细啜慢饮、涤烦益思的饮茶生活有利于抚慰文人满怀激愤的身心,成为调和政治危机与个人处境的一种圆融策略和生活艺术。

(二)茶性提神醒脑促进文人静虑自省

饮茶除了调适文人士大夫的官场束缚之外,亦有一种反躬自省的韵味。自省是传统文人的品格之一。阳明心学主张的“心即理”“致良知”,强调的就是一种自省功夫,这对塑造中晚明文人性情有重要作用。与酒性迥异的是,茶具有清凉苦寒、提神醒脑的功效。饮茶不仅使文人满足解渴除困的身体需求,还为文人提供了心平气和的内省空间,使其通过茶这一物质媒介进行清醒的人生反思和心灵沟通,以此平衡与调节文人内心的痛楚,满足其超尘脱俗保持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愿望。

浙江山阴人张岱晚年回忆起曾经的奢华生活时,似有一种反省的意味,“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②。张岱自言其“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③,晚年隐居山中避世著书。山居期间,张岱生活困倦潦倒,甚至有断炊之难,但嗜茶之心不改。茶对他来说是精神的寄托,他自比卢仝好茶成癖:“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齐名;七碗吃不得了,卢仝茶不算知味。一壶挥麈,用畅清谈;半榻焚香,共期白醉”^④。张岱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外有国破家亡危机,内有安身立命困扰,但他并没有放浪形骸,而是选择隐遁山林,著书立说,以此寻求人格独立,实现人生价值。

晚明文学家袁宏道(1568—1610),曾任吴县县令,万历二十五年(1597)解官后,常饮茶反省人生。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寄信给远在北京的好友李湘洲,诉说自己年轻时沉迷声色,劝慰好友勿重蹈覆辙。信中写道:“回思往日孟浪之语最多,以寄为乐,不知寄之不可常。今已矣,纵幽崖绝壑,亦与清歌妙舞等也。愿兄早日警发,他日意地清凉,得离声色之乐,方信弟言不欺也。”^⑤他感叹在职时因公务烦扰嗜茶之癖全无:“吏吴以来,每逢好事者设茶供,未尝不举以自笑。然务烦心懒,茶癖尽蠲,虽复倾国在前,而主人毫且贖,较之癭瘤之嗜,十分未得一也。”^⑥当友人问他辞官后有什么心愿,他回答:

① 《文征明集》(增订本上)卷十《七律》,第264页。

② (明)张岱:《琅嬛文集》卷一《梦忆序》,云告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11页。

③ 《琅嬛文集》卷五《自为墓志铭》,第159页。

④ 《陶庵梦忆注评》卷八《露兄》,第235页。

⑤ 李鸣选注:《袁宏道》,《李湘洲编修》,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年,第195页。

⑥ (明)袁宏道著,孙虹、谭学纯注评:《袁宏道散文注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0页。

“愿得惠山为汤沐,益以顾渚、天池、虎丘、罗芥,陆、蔡诸公供事其中,余辈批缁衣老焉,胜于酒泉醉乡诸公子远矣。”^①确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茶成了他的精神伴侣。

茶性清苦,与佛家倡导的“苦谛”相契合。面对政治腐朽,中晚明江南文人试图通过寺院饮茶寻求致静无求的心灵寄托,他们通过与僧人共同参禅摆脱尘俗污染,明心见性,以此获得参悟禅宗思想的愉悦即“禅悦”,在参禅论道中淡泊心志,以平常心看待世俗人生。陆树声闲居期间与禅僧交往频繁,“时杪秋既望,适园无净居士与五台僧演镇、终南僧明亮,同试天池茶于茶寮中”^②。李日华与道光禅师交往甚密,其《赠道光老禅》一诗不仅描绘了饮茶景象,还深具禅机佛理:“一室绝尘虑,焚香坐悄然。竹敲松子下,泉迸石痕穿。灯火身为伴,茶铛手自煎。谁言不出户,来往第三禅。”^③袁宏道《游虎跑泉》诗曰:“竹床松涧净无尘,僧老当知寺亦贫。饥鸟共分香积米,落花常足道人薪。碑头字识开山偈,炉里灰寒护法神。汲取清泉三四盏,芽茶烹得与尝新。”^④诗人与禅师在竹林松下饮茶,其景之清,心境亦清,不由地让人忘却浊世的烦恼,于自然朴素中蕴含着佛理禅机。王世贞《山行至虎跑泉庵次苏长公石刻韵》描写其秋后至虎跑泉寺与僧品茶体悟禅机:“百草沾风蚕月香,双鸠唤雨麦秋凉。过桥已觉世情少,到寺始知僧日长。拂藓石留行脚偈,挂瓢泉是洗心方。良公更有茶瓜在,禅悦能容取次尝。”^⑤湖州文人丘吉《寄馆天宁寺》将品茶与参禅境界融为一体:“茶炉吹断鬓丝烟,借得禅林看鹤眠。不道秋风何处起,一堆黄叶寺门前。”^⑥其诗总体呈现一种幽雅清静的画面,给人以远离尘嚣之感,体现了作者追求心灵安宁慰藉的思想境界。茶性促进文人反省人生,在品茗谈禅中静心自虑,静静地体会内心的澄明与愉悦,回归本原的自然心性,达到禅悦的境界。

(三)茶性自然纯真契合文人贵真求真

茶生长于优良的生态环境中,承甘露之滋润,蕴日月之精气,大自然赋予其纯真清静的秉性,茶之色、香、味无不打上“真”的印记。明代中后期的多部茶书中都论及茶具具有“真”的特点:张源《茶录》言:“茶自有真香,有真色,有真味。一经点染,便失其真。如水中著咸,茶中著料,碗中著果,皆失真也。”^⑦程用宾《茶录》言:“茶有真乎?曰有。为香、为色、为味,是本来之真也。”^⑧黄龙德《国朝茶说》曰:“茶有真香,无容矫揉。……如是光景,此茶之真香也。少加造作,便失本真。”^⑨

茶性自然纯真契合了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贵真求真的精神。徐渭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中晚明文人“贵真”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写道:“夫真者,伪之反也。故五味必淡,食斯真矣,五声必希,听斯真矣,五色不华,视斯真矣。凡人能真此三者,推而至于他,将未有不真者。故真也则不摇,不摇则神凝,神凝则寿。”^⑩徐渭坚持返璞归真,推崇“真我”,是对保守僵化的礼教扼杀天然本性的

①(明)袁宏道著,孙虹、谭学纯注评:《袁宏道散文注评》,第40页。

②(明)陆树声:《茶寮记》,《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14页。

③(明)李日华:《恬致堂集》(上)卷五,赵杏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8页。

④(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5页。

⑤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通志》卷二七六《艺文》,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767页。

⑥陈田辑撰:《明诗纪事》(二)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08页。

⑦参见杨东甫《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63页。

⑧参见杨东甫《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370页。

⑨参见杨东甫《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525页。

⑩(明)徐渭:《徐渭集》第三册《徐文长逸稿》卷十四《赠成翁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8页。

质疑与超越。明代文学反对复古运动主将袁宏道提倡“性灵说”。他认为：“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①与“真人”相应，晚明尤为重视“真心”，亦称“童心”“性灵”等。李贽是“童心说”的坚定支持者。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②这些观念对当时文人的心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江南文人在饮茶生活中领悟茶的自然纯真秉性，追求自然本真、率性而行的生命状态。

综上所述，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生活追求因时局变化而发生动摇，茶成为文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不仅点缀了文人日常生活的诗情画意，还融入了文人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追寻。作为明代茶文化的践行者，江南文人追求适情适性、清雅幽趣的饮茶生活，在煮茶品茗中赋予其恬淡闲适的隐逸情怀和淡泊自守、静虑自省、贵真求真的文化意蕴，他们推动了明代茶文化的发展，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任编辑：董德英

Tea Drinking Life and Cultural Meaning of Jiangnan Literati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Qian Guoqi¹ Xue Fanhong²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China; 2. Shantou Center for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Shantou 515041,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ea drinking was very popular in Jiangnan society, and scholars were the main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ea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daily life of Jiangnan literati was so closely related to tea that drinking tea was a must on such occasions as reading, literary and art gatherings, socializing and travel. The scholars liked to boil and taste tea, embodying their pursuit of value and ideal life in daily tea drinking. Endowing tea culture with connotation, the Jiangnan literati reflected the spirit of the literary community throug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ea. Tea has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keeping people calm and less obstinate, refreshing the mind and cultivating natural innocence. It conformed to the literati's spiritual pursuit of indifference to official career, introspection, contemplation, valuing truth and seeking truth. The life of drinking tea also embodied the literati's tranquil and leisurely feelings, which infused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ea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ea drinking life of Jiangnan literati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spiritual core of tea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Jiangnan literati; tea culture

①《袁宏道集笺校》(上)卷四《识张幼于箴铭后》，第193页。

②(明)李贽：《焚书续焚书》卷三《杂述·童心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8页。